



沈德潜在镇江编纂《古诗源》

□ 于锡强

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熠熠生辉，其中成就最高、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诗。诗书易礼乐春秋传承至今，《诗经》为六经之首。以言志、以抒情，七情六欲，彻透天地，天人合一皆存诗中。诗在人生中不可或缺，是取之不尽的宝库，百学不厌受益无穷。沈德潜在镇江编纂的《古诗源》也是近代流行的古诗读本。

沈德潜(1673—1769)，字槁士，号归愚，长洲(今江苏省苏州市)人。22岁那年考中秀才，被录为长洲县廪生，他是一名大器晚成的饱学之士。沈德潜少年丧母，父亲靠坐馆授徒维持生计，家境很是一般，一家人衣食不周，生活窘迫。从23岁起沈德潜不得不去做教书先生，边赚些碎银养家，边继续科考之路。但这一路走得很慢很不顺。从第一次参加举人试开始，他几乎每科都赴试，每次都落榜，十六次乡试，十六次败北，憔悴惶惶，一考就是四十多年。但沈德潜不信不弃、愈挫愈奋，乾隆三年(1738)的乡试他又去了，这一年他66岁，终于等到了“转运年”，成了一名白发举人！接着会试中第65名；67岁，殿试后，中二甲第8名；70岁，散馆考试他考了第四名授翰林院编修，成了皇帝的近侍之臣才开始了高光人生，后官至内閣学士兼礼部侍郎。

在未取得功名前沈德潜以授徒教馆为生，过了40余年的教馆生涯。在江南一带很有名声，尽管处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弃学，在奔波生活之余勤奋读书，十六岁前已通读《左传》《韩非子》《尉繚子》等书。他早年师从叶燮学诗，曾自谓深得叶燮诗学大义所谓“不止得皮、得骨，直已得髓”，其自负可见一斑。他将叶燮精化的理论与大众所需要的价值标准结合起来，构建了宏阔融通，成为普通文人所接受的诗史框架。

44岁那年他来到京口住在见山楼做了三年教馆，在此期间他编纂《古诗源》一书，将先秦至隋各个时代的七百余首诗歌收录其中，并对大部分诗作加以评注和考订。全书共十四卷。除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离骚》已备不收而外，但凡郊庙乐章里童谣无不收录其中。他自称“虽不敢谓已尽古诗，而古诗之雅者略于此，凡为学诗者，导之源也”。他在书前撰《序》说明取名为《古诗源》的原因：“诗至有唐为极盛，然诗之盛，非诗之源也。……则唐诗人，宋、元之上流，而古诗又唐人之发源也。”既然所选皆是唐以前的古诗，追根溯源古诗是唐诗的源头，故取名《古诗源》。

他在《例言》中对列朝诗歌逐一予以简短而精要的评论：“康衢击壤，肇开声诗。上自陶唐，下暨秦代，韵语可采者，或取正史，或载诸子，杂录古逸，冠于汉京，穷诗之源也。诗纪备详，兹择其尤雅者。”如收录的《击壤歌》：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与我何有哉！”言浅意深，明白如话。展现了丰富的社会活动内容。

“苏李以后，陈思继起，父兄多才，巢尤独步，故应为一大宗。郭下诸子，各自成家，未能方埒也。嗣宗触绪兴怀，无端哀乐，当涂之世，又成别调矣。”他对曹操、曹植及建安诸子、两晋诗人中左思、陶渊明、刘宋诗人中谢灵运、谢朓和鲍照特别推崇。

“萧梁之代，风格日卑。隐侯短章，犹存古体。文通仲言，辞藻斐然。虽非出群之雄，亦称一时作者。陈之视梁，抑又降焉。子坚孝穆，并以总持。略其体裁，专求名句，云差强人意者耶。梁时横吹曲，武人之词居多。北音铿锵，铎铎铿锵。企喻歌、折杨柳歌词、木兰诗等篇，犹汉魏人遗响也。北齐敕勒歌，亦复相似。”这是他对南北朝时梁、齐诗歌的评价。

“北朝词人，时流清响。庾子山才华富有，悲感之篇，常见风骨，所长不专在造句也。徐庾并名，恐孝穆华词，瞠乎其后。”他对徐陵、庾信极为推崇。体现了他反对绮靡而注重诗歌社会内容的宗旨。

“隋炀帝艳情篇什，同符后主，而边塞诸作，矫然独异，风气将转之候也。”这是对隋代诗歌到的评价。

沈德潜是一位有眼光的选家，《古诗源》因篇幅适当，笺释简明，成为近代流行的古诗读本。后世的扫叶山房刊出的石印本名为《评选古诗源》，说明此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“选编辑录”还有“评介注释”。诗后评语不乏精当或具有启发性的见解。

沈德潜在《序》的篇末写道“康熙己亥夏五长洲沈德潜书于南徐之见山楼”表明此书成于镇江。沈德潜到京城做了高官后仍怀念在京口的日子和结交的诗人，他在《怀南徐诸子》诗中写道：“海岳庵前结古欢，归来每忆旧诗坛。百年身世知音几，两地关河会面难。南国霜清吴苑晚，西津木落大江寒。何时更路三山顶，万里登临眼界宽。”抒发了浓浓的思念之情。如今见山楼虽已消失在岁月的长河，但在这里的编纂《古诗源》仍在世间流传历久弥新。

“京江”与“扬子江”——长江镇扬段历史上的别名探述(二)

□ 乔长富



镇江、扬州之间的这段长江，历史上除了有“北江”“曲江”“丹徒江”等别名之外，还曾有“京江”“扬子江”这两个更重要的别名。对于“北江”“曲江”“丹徒江”，笔者已有小文述及，这里则是探述“京江”和“扬子江”这两个别名。

京江。对于“京江”，《辞源》说：“长江下游称扬子江，亦名京江。因流经镇江市，而镇江市古名京口，所以称京江。”《辞海》也如此说。但据《光绪丹徒县志》卷三所录唐代徐坚《初学记》说：“长江有别名，则有京江。江带郡县为名，则有丹徒江。”由此看来，“京江”是不“带郡县为名”，即以“京口”为名，而是以“京”地为名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京江”的得名时间当不晚于“京口”得名的时间。再从“京口”得名的时间看，“京口”在西晋晚期已有其名(参《宋书》“武帝纪”上)，那么“京江”得名的时间当不晚于西晋晚期。它当是由“丹徒江”的别名发展而来。

“扬子江”。对于“扬子江”的得名，《辞海》说是“因扬子津、扬子县得名”。《辞海》也持其说。但是，据《旧唐书》“地理志”记载，扬子县是唐高宗永淳元年(682)“分江都县置”。又据《光绪丹徒县志》所录诗，隋代诗人柳絮已有《奉和晚渡扬子江应制》及《奉和晚日扬子江应制》诗，可见早在隋朝已称“扬子江”，“扬子江”得名的时间要早于“扬子县”，而“扬子江”也是不“带郡县为名”，它当是因“扬子津”得名。它的得名时间，当不晚于隋朝。可以说它是长江镇扬段历史上出现最晚的一个别名。

“京江”和“扬子江”得名后的流行情况。对于这个问题，虽然限于文献以及笔者识见，今天很难有个全面而具体的解读。但是从《全唐诗》《宋诗纪事》《光绪丹徒县志》等所录有关诗歌中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以下一些重要迹象。

唐人诗中，较早咏及“京江”及“扬子江”的，有王昌龄的《宿京江口期刘春虚不至》、孙逖的《扬子江楼》、丁仙芝的《渡扬子江》等诗。它们

的作者都是盛唐人。这种情况表明，“京江”和“扬子江”的名称开始流行于世，当不晚于盛唐。而且，当时“京江”和“扬子江”这两个名称是并行于世。

“京江”和“扬子江”自得名之后，人们在称呼方面，一般是从扬州的角度称“扬子江”，从京口的角度称“京江”。例如，丁仙芝的《渡扬子江》、孙逖的《扬子江楼》等就是从扬州的角度称“扬子江”；王昌龄的《宿京江口期刘春虚不至》、杜牧的《杜秋娘诗》称“京江水清清”等，就是从京口的角度称“京江”。但是，也有混合称呼的情况，例如，丁仙芝诗题称“扬子江”，诗中却说“京江两岸青”；五代徐铉诗题《京口江际弄水》诗中却说“扬子江南二月天”。由此可见，人们称“京江”还是称“扬子江”是有区别，又有联系。不过，唐代比较流行称京口与扬州之间的

这段长江为“扬子江”或“京江”，则是事实。唐代以后，从两宋到明代这段时期，对于镇江扬州之间的这段长江，宋人大多称“江”或“长江”，例如，《光绪丹徒县志》所录范仲淹《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》说“长江天下险”。但也有少数称“京江”“扬子江”的诗。例如，北宋沈遘《和孙少述润州望海楼》说“京江浩浩海门连”，南宋程卓《游金焦二山》说“扬子长江天际来”，文天祥《饮中冷泉》说“扬子江心第一泉”。此外，北宋梅尧臣诗题为“京口水”；南宋《嘉定镇江志》称之为“京江水”，并说“《祥符图经》谓之‘京口水’”。

到了元代和明代，《光绪丹徒县志》所录元人诗，则有严绳孙《雨中渡扬子江》、柳贯《晚渡扬子江》、郭界《宿焦山上》称“扬子江头风浪平”，吴棫《风雨渡扬子江》等，但未见

“京江”诗。可见元代比较流行称“扬子江”。《至顺镇江志》称之为“京口水”，又说“又谓之扬子江”。《光绪丹徒县志》所录明人诗，则有王偁《过扬子江》、王鏊《渡扬子江》、王心一《归渡扬子江》等，也未见“京江”诗。而且，明“一统志”也说“镇江府……北至扬子江二里”(《光绪丹徒县志》卷一引文)。这种情况表明，明代比较流行称“扬子江”。

到了清代，《光绪丹徒县志》所录，有钱谦益《渡扬子江》、查慎行《月下渡扬子江》和《雪后渡扬子江》，黄始《至京口早渡扬子江》、陈杰《扬子江救生船歌》等都称“扬子江”。“京江”诗，则有严绳孙《烟雨渡江》称“京江春树”，钱谦益《渡扬子江》称“京江北路”，屈大均有《出京江口》，陈彭年有《京江杂诗》。可见清代是称“扬子江”为主。而且清代洪亮吉撰的《乾隆府厅州县图志》卷五“江宁府”明确说：“大江在城北……又东入镇江。亦曰扬子江。”由此可见，在清代，“扬子江”的别名流行程度已超过“京江”，最终是“扬子江”成为长江下游主干的主要别名，“京江”的名气显然已不如“扬子江”。

推原“扬子江”之所以能成为长江下游主干的主要别名，原因当有多方面。笔者以为，其中重要原因，当是名称本身说，“扬子江”名称比较明确，不容易产生误解，而且这个名称读起来更为响亮。更重要的是，由于“京江”名“京”，“京”在古代更重要的含义是指首都，因而人们不大会想到“京”地或“京口”，以至到了近代，人们曾把“京江”与“镇江”“靖江”混为一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扬子江”比“京江”在主观上更具有竞争力，因而能最终后来居上成为镇江、扬州间这段长江以至长江下游主干的主要的别名。当然，这里所说还只是笔者的一点臆想。还有更多的社会和历史原因，使得扬子江能成为长江下游主干的别名，则有待人们做深入的探讨，以探求到更多的“骊龙之珠”。

东郊湿地千棵柳的变迁

文/图 黄胜国



焦东湿地千棵柳滩涂现状



《光绪丹徒县志》地图中标注有千棵柳地名

镇江东郊有一处名叫千棵柳的地方。位于焦东象山镇江村东片护堤坝北面外侧湿地江滩上。是由单一树种千棵柳组成的柳树林。现存在东西江滩二处。其中焦东最大一处千棵柳树林约1公里长，80至100米宽，另外一处千棵柳位于焦东垃圾填埋场东侧，面积较小，2处柳树林相距2公里不到。

关于千棵柳的历史沿革背景情况，目前可以查阅到最早史料记载是在《光绪丹徒县志》(何绍章、冯寿镜 清光绪5年1879年撰修)里。

《光绪丹徒县志》卷首有地图标注了千棵柳地名，位置大约在今天象山以东，焦东长江江滩一带，南面到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北大门附近。现今大致位置是禹山路与谷阳路交叉向北进入，靠近中冶蓝湾小区北面，经过原长江村村委会东西两侧数百米江滩。该志书里关于千棵柳文字还有两处记载：“咸丰年间云南通海知县吕之朴住居焦东吕家圩，村名沿用至今”。另有一条“荒村录”有“千棵柳”一名。

1998年版《象山乡志》记载：“民国25年(1936年)，镇江县城(一区)划焦东乡为象山、京岷、斧鼎、千柳4个小乡。民国27年(1938年)8月，象山、京岷、斧鼎、千柳4乡合并，称焦东乡。34年(1945年)复将焦东乡分为象山、京岷、斧鼎、千柳4乡。37年(1948年)11月，4乡合并复称为焦东乡。1956年4月，原京岷、斧鼎乡的部分自然村划给千柳乡，其余划象山乡。同年9

月，千柳乡合并给象山乡”。

1995年版《润州区志》记载说，“汝山乡长江行政村，东界江苏工学院，北临长江，村委会驻卢家圩。1959年，建立千柳大队，‘文化大革命’期间更名，因北临长江而得名。1983年，撤大队建行政村，有吕家圩、东八岸、西八岸、卢家圩等8个行政村。”

《镇江地名录》(镇江市地名委员会编印，1983版)：“长江大队，原名千柳大队，驻地吕家圩。千棵柳村实际是由卢家圩和吕家圩两个小村子组成的。中间间隔了一条小河，后“千棵柳”村名易名为“长江村”。“长江村”村名一直沿用至今。总结历史上长江村的地名叫法：先后有过千棵柳村，千柳乡，千柳大队，长江村拆并。2013年千棵柳所在的吕家圩、卢家圩拆并已经不存在。

历史上名人谈及千棵柳地方，有诗文可以考据有清郑板桥作《菩萨蛮宿千棵柳》，词云：“渔家泊在清淮口，西风稻熟千棵柳，茅店挂新红，酒旗青更浓；买酒将鱼换，得酒船头转，岸上打场声，渔歌水上清。”另有民国时期才子卢冀野(1905—1951)，于1934年春郊游镇江曾作《京口春游，次荆西太一诗韵》六言诗云：“倦矣天涯羁旅，几回梦到村西。门外千株杨柳，归来燕子凄迷。”他又在诗末注释中批言：吾家本丹徒，祠墓千棵柳村。余数过京口，迄未能往。

在镇江民间还有关于千棵柳这样一个故事传说，清朝时候，镇江本地有一个人做

了朝廷高官，功成名就，衣锦还乡凯旋之际，看到居住在长江边上的老家人年年遭受长江洪水灾祸水患之苦，他便把皇帝赏赐给他的财物全部捐赠出来，变换钱物，购买大量柳树，在家乡堤坝外长江滩涂种植，种植了整千棵柳树，保护了江水对堤坝冲刷塌陷造成的危害，从而由此避免了夏季水患破堤之灾。

综合历史资料，可以佐证镇江焦东长江村东侧的千棵柳的历史沿革情况，据此可以推断，在晚清光绪年间之前，就有千棵柳地名，栽种柳树生长成林。距今至少已有150年以上历史。

如今走到千棵柳附近，远看是一片茂密森然的壮观树林，走进树林里才感受到植物生命的强大与震撼。数百上千棵柳树直立或者少数枝干倾斜，生长在湿地滩涂上，茂密繁盛，很多树冠有1米多，主干明显，但多在树高2米多处分叉生长，显然是很多年前经过修剪整枝以后形成的长势树形。实际探查中发现很多柳树已经主干空洞，主干内部烂掉中空，只剩下外面的圆形木质化韧皮部位还分枝生长抽条发叶。在一些空洞的树洞中寄生或者寄生着很多野生花卉。形成千棵柳树林里特有的植物共生奇异现象。很多柳树主干和枝条上生长着长须般密布的气生根，可见在夏季江水上漲时节，这片柳树林曾无数次被淹没过。生长在江水中的柳树为了呼吸而长出了气生根。也显示出以前长江水位的高低状态。

古今风俗话立夏

□ 崔道斌



立夏乃夏之初。历书上说：“万物至此皆长大，故名立夏也。”立夏这个节气，在战国末年就已经确立，预示着季节的转换，为古时按农历划分四季之夏季开始的日子。

古代，人们非常重视立夏的礼俗。据记载，周朝时，立夏这天，帝王要亲率文武百官到郊外“迎夏”，并指令司徒等官去各地勉励农民抓紧耕作。旧俗立夏日又为民间传统节日，称“立夏节”。

汉代也沿承此俗，《后汉书·祭祀志》载：“立夏之日迎夏，于南郊，祭赤帝祝融，车旗服饰皆赤。”《宋书·礼志》：“立夏之日，礼仪更趋繁缛。至明代始有“尝新风俗”。清代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载“立夏取平时晒晒之米粉春芽，并用糯面煎作各色果叠，相互馈赠”。

立夏是夏季的开始，也是农家的大忙季节。正如宋代范成大在《村居即事》诗中所云：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采了蚕桑又插田。”我的家乡，有“立夏吃蛋”的风俗。记得儿时，谷雨刚过，母亲就开始为立夏作准备。那时家里的口粮少，家禽就不敢多养，只有几只下蛋的鸡。平日，母亲都把积攒的鸡蛋卖了，换回生活必需品。而立夏前，母亲却一个鸡蛋也舍不得卖，怕到立夏那天没有鸡蛋吃。“立夏吃蛋，石头踩烂”，母亲说，立夏吃了蛋，人就会劲头足。立夏当日，母亲还将煮熟的鸡蛋，用彩色颜料画上各种图案，装进用丝线编成的蛋套，挂在我的脖子上。这时，家家户户的小孩，便三五成群，相互用力比试，称为“斗蛋”。蛋分两端，尖者为头，圆者为尾；斗蛋时蛋头斗蛋头，蛋尾斗蛋尾，破者认输。

立夏这天，家乡还有“秤人”的习俗。吃罢中饭，人们在稻田的槐树下，挂起一杆大木秤，秤钩悬一根凳子，大家轮流坐到凳子上面秤。一边秤，一边讲着吉利话，祈祷一年四季平平安安，无病无灾。

农谚云：“立夏葱头齐”。到了这个节气，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，小麦开始扬花灌浆，油菜即将成熟，夏收作物丰歉基本定局，故农谚有“立夏看夏”之说。

“春争日，夏争时”。意思是说，农事安排，春光宝贵，夏时如金。“春种晚一日不如早一日，夏种晚一时不如早一时”“蚕老一时，麦熟一响”，只有把握农时，辛勤耕耘，才能收获满满。

